



## 聖神研究中心：突破與回應

意大利主教團福傳奮興中心非洲及亞洲部主任 梁作祿 著  
林瑞琪 譯

十年前《鼎》雙月刊的面世絕非出於偶然。隨著中國大陸、天主教會，以及整個世界歷史大事的發生，這份新的雙語雜誌也應運而生。它在香港以至中國大陸及海外各地所取得的成功，說明它的誕生實在切合時宜。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主席宣佈新中國成立時，自豪地說出中國人民終於能夠站起來了。他這句話有一定程度的真確。可惜的是，共產主義中國事實上完全斷絕一切與西方世界的關係，因而生活上每一環節都瀰漫著冷戰及對立的氣氛。周恩來總理運用其超卓的外交手腕，努力打破孤立的局面，於一九五五年成功地在印尼召開「不結盟國家」會議。不過，在聯合國的中國代表席位，仍操之於退守台灣的國民政府手中。

當時，中國政府有計劃地對付基督徒傳教士，更使西方國家的民意傾向於對這個緊隨蘇聯模式的政權產生顧慮和猜忌。西方基督徒對中國教會所面臨的嚴峻處境尤感震驚。但他們對中國人民的熱愛之情始終未嘗稍減。過往多個世紀以來，數以千計的男女，自願追隨基督的召喚，畢生致力於在中國的土地上耕耘的事蹟，仍深深地印在他們心中。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於五十年代末期當選之後不久，隨即宣佈天主教會召開大公會議。

他打開了一個新紀元，引發起前所未有的廣泛反應。不過，雖然教會按照大公會議的精神，與在蘇聯的教會開始接觸，但在中國所出現的隔漠卻始終無法突破。天主教愛國會的成立，及未有遵照教會法律而祝聖主教等事情，更使雙方的對立到達空前的尖銳程度。教宗曾一度有意視中國教會的情況為裂教，但一群流亡海外的中國主教（包括中國籍及外籍者）說服了他，指出對整個中國教會作出這樣嚴厲的判斷可能是一項重大的錯誤。王守禮主教（他過往被中國政府驅逐出寧夏，當時任宗座華僑傳教視察專員）及香港的白英奇主教（他本人兩度遭共產當局囚禁獄中）的見解更見積極，兩人都親自晉謁教宗若望二十三世，為中國教會的國籍主教說項。❶

六十年代中期，毛澤東掀起「文化大革命」，推使中國陷入一片恐怖風暴之中。現在，整個國家包括黨領導層在內，均毫無保留地斥之為大災劫；但當時國內懾於極權統治的鎮壓，人人都噤若寒蟬。至於對外關係方面，這個政權成功地蒙蔽個別的觀察家，並利用傳播媒介，掩飾了事件的真相及其實質的破壞力。

正因為這樣，紅衛兵在當時大部份西方國家眼中，成了新一代完全擺脫封建傳統，

並且有力締造新的理想社會的象徵。就在這種氣候下，教宗保祿六世於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在聖伯多祿大殿一次莊嚴的典禮上，表達了與中國人民及中國青年重新建立關係的熱切期望，他說：「天主教會明白且樂於見到中國現時所處於的歷史性轉捩點。說得正確一點，就是她致力於從舊有的一切，即傳統的形式，過渡到工業化及現代社會結構所必然產生的新世界。」<sup>②</sup>

在其後幾年間，西方的教會團體對中國人民的持續關注及愛心，帶出了不少新的構思。其中一個新的團體是 SEDOS，是設於羅馬的資料及研究中心，由一批修會團體及傳教組織所組成。他們為有興趣了解中國實況進展的人士組織聚會，並把他們組合起來。他們的注意力自然是集中在宗教方面。一九七零年，他們產生了一個新意念，要更有組織及長期地結合力量，與在香港工作的修會團體合作，促進對中國社會及中國大陸的基督宗教的研究，加強接觸、交談，並把西方基督宗教的古典文獻翻譯成中文。可惜的是，很多無緣無故的偏頗報導，把這個構思說成是教宗企圖在中國復興天主教的秘密計劃，並認為這個構思應該擱置，以免不必要的對立。

同年五月，美國天主教主教團發表聲明，建議美國政府與中國大陸上的人民建立及發展切實可行的關係。當年八月，北京政府於是釋放了被囚在獄中的華理柱主教。到十月份，教宗保祿六世訪問遠東時，在香港作了具有象徵意義的停留，並且再一次表達他對中國人民的熱愛。

許多活躍於政界的西方天主教徒領袖，都在與中國發展正常化關係的過程中扮演關

鍵性的角色。由基督教民主黨所領導的意大利政府，於一九七零年十一月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外交關係。一年之後，本身是一名熱心教友，又在意大利政府擔任部長的國會議員哥倫布（Vittorino Colombo）到訪北京，與周恩來總理作了長時間會談。翌日，中國回應了他所作的特別請求，重開了北京的無原罪總堂（南堂），方便崇拜；這是文化大革命以來的首次突破，時維一九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sup>③</sup>

中華人民共和國終於在一九七一年十月取得在聯合國的會籍。雖然梵蒂岡與北京之間的長久爭執仍懸而未決，但教廷的官方報章仍樂於見到事情的進展，並重申教宗保祿六世早在一九六五年出席聯合國會員大會時所提出的，肯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應有權派代表出席這個世界舞台。<sup>④</sup>

隨著梵二所引發的更新運動，很多關注中國的天主教神學家，認為他們需要正視這個經歷了最極端的社會主義革命國家的經驗。設於布魯塞爾的天主教資訊及研究中心 Pro Mundi Vita，及設於日內瓦的信義宗世界聯合會研究部，均以普世教會合一思想去鑽研傳統基督宗教思想與中國經驗間所觸發的問題。一九七四年九月在魯汶舉行的研討會，讓九十多位參加者有五天的機會辯論這些富挑戰性的問題。他們所發表的意見，從對毛澤東革命作出嚴厲的批評，以至毫無保留地稱譽這個革命為真正的基督徒發展的模式，莫衷一是。<sup>⑤</sup>該次研討會在基督徒圈子以至於教外的報章，都產生很大的回響，其後並出現兩項新發展，一是每兩年定期舉行基督教與天主教的專家聚會，從基督徒的觀點去審視中國經驗的演進；另一方面，一個名為

「歐洲天主教徒關注中國」的小組，定期在不同國家進行聚會，以加深在各方面對中國經驗的認識。①後來，額我略大學的神學家及其他學者，應邀到羅馬共同深入探討中國經驗的問題。②

在香港，一九七一年九月即開始檢討魯汶會議的成果。自此以後，香港人對這問題的積極參與，為後來在其他國家舉行的會議，帶來實質的貢獻。一九七九年初，一群亞洲神學家聚集在香港，以新眼光探討亞洲地區出現的種種問題，其中順理成章也包括中國實況所引發的事物。

筆者在離港多年以後，再次投身當地的天主教團體，個人來說，深受一片充滿期望的氣氛所感動。似乎每個人對當時推翻了極左政權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發展，都抱著懷疑又充滿難以言喻的希望的态度去觀望。

在一年之前的一九七八年五月，筆者隨同一個意大利官方代表團訪問中國之際，有幸成為文革以後最先在上海會見張家樹主教的少數人士之一。（當局格外開恩地讓我們會面，但仍難免令到這次見面充滿神秘及懸疑的氣氛！）在該次及其後的中國行程中，筆者經常與知識份子接觸，深受啟發。儘管他們所身處的官方架構並不容許他們保留太多的個人意見，但不久之後即顯示出，外界社會對中國發展所能夠做到的最大貢獻，就是促進與中國的科學及文化交流。而香港正處於最理想的位置，擁有足夠的人才，他們也熱切希望滿足「同胞」的急切需要。

回顧由香港教區十年前所成立的聖神研究中心的貢獻人們會發現《鼎》雙月刊確實充份地表揮其功用，成為卓越的文化交談工具，為中國教會與社會的更新作出一定程度

的珍貴貢獻。在個人方面來說，筆者實在由衷地喜見過往十年來，對中國一往情深的朋友在早期所播下的種子，到而今已發榮滋長。我還清楚記得，一九七九年九月，我為香港教區司鐸議會及教區當局草擬計劃書，籲請教區成立這方面的專責機構，由一位中國籍神父全職主理。一九八零年二月，另一份致送予各修會會長的計劃書中，筆者強調各修會應責無旁貸地與香港教區的這項新計劃衷誠合作，在一切可能的情況下為改善中國天主教團體的實況而貢獻一份力量。

十二年前逝世的著名意大利佛羅棱斯市長拉培內（La Pira）教授，早在冷戰時代，已勇敢地把基督徒的遠見及希望，套用在克里姆林宮的領導層、河內的胡志明以及北京的周恩來身上。③我們忽略了他當時所得到的答覆。不過，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於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十八日在羅馬發表的公開演詞中，明確表示承認真正的人道主義對人類進步的重要性。他說，「你們的人道主義者拉培內教授，也是我們所熟知的人物。他在冷戰時期經常說，當代歷史的主要傾向之一，是東西方之間將出現持久的和平，這將會是世上所有國家及民族在一個全人類大家庭之下，首次締造出的和平。這個預言今天在我們眼前實現了。」④

東歐最近的新發展，出人意料地加速了人類生活邁向互相依靠及更人性化的進程。誠然我們相信這種趨勢可能會慢下來，但決不會完全陷於停頓甚或出現倒退。我們作為基督徒的，有特別的責任在這事上貢獻一份力量。《鼎》雙月刊正是默默地在這方面耕耘，筆者實在與有榮焉。

（附註見本刊頁90）